

# 抗日战争时期 的马来亚共产党干部

原不二夫

## 前言

就马来亚 1930 年以后的抗日运动及日本占领时期的抗日战争，已有不少研究专著。<sup>①</sup> 这些运动的核心虽然都是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略为“马共”）和日军占领后在该党领导下成立的军事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下略为“抗日军”），但到 1980 年末为止，就领导了这些抗日运动、抗日战争

---

原不二夫博士 现任日本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① Stephen Leong,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 1976.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G.Z. Hanrahan,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71) (初版 1954 年) .

F.S. Chapman, *The Jungle is Neutral*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7).

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6*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海上鸥,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新加坡: 华侨出版社, 1945); 许云樵(原编)、蔡史君(编), 《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新加坡: 文史出版社, 1984) 等。



和抗日军的马共干部的记载，除了当时的马共党委总书记莱特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被提到。以往研究的主要依据都是取自英殖民地当局编纂的资料，欠缺来自马共方面资料的依据及补充，可能是造成研究出现“空白”的背景。1948年，由于马共开始了武装斗争和政府当局宣布了马共为不合法团体，很多抗日战争时期的当事者，或潜入了地下，或被驱逐出境强行送回中国，剩下的其他人也都被迫保持沉默，因此除了由政府当局蓄意发表的有关情况外，外部人很难再了解到有关马共方面的情况。不过自从1989年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及泰国政府之间缔结了和平协定，马共在事实上停止了活动以后，有关马共方面的史料和情报逐渐地开始得以公开出版、公开化。回到了中国的一些（多是一些被强行驱逐者）当时的马共当事者，开始倾诉多年来隐藏在心中的当年往事，可作为其代表之一的有由新马侨友会编纂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sup>②</sup>和《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sup>③</sup>两书。只是遗憾的是，这两本史料，可以说都比较粗枝大叶，分析也欠缺系统化，因此需要以这些研究为重要素材，同时斟酌近年来问世的其他史料和情报，重新整理这一段历史。本稿旨在尝试依据一些最新资料，就当时的马共领导人的出身、经历等情况，尽可能地进行详细探讨，以求解开当时抗日运动及抗日战争的实态。

在被视为是随军记者筒井千寻根据宪兵情报撰写而成的《南方军政论》中，其“开战前后时的（马共）组织概要”里载有下记图表（图表见51页）。筒井作为“每日新闻”社的南方特派员，在“大东亚战争”开始后不久，曾历巡过日本的所谓“南方占领地”。之后又以“昭南军政监部随从”的身分，驻在新加坡（见《南方军政论》，页335的〈著者简历〉）。此表登载在该书第三节〈南洋共产党〉（2）中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口号和组织〉一文中。

---

②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见证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以下略为《抗日军》）。

③ 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香港：见证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以下略为《选辑》）。

一般视《南方军政论》第三节为作者筒井在日军宪兵队的同意下，整理自“昭南宪兵队”大西觉特别警察队长根据莱特提供的情报撰写的资料而成的。把此书与近年来公开了的马共方面的有关资料相对照，可知此书所载有关当时的一些历史事实极其准确。

以下拟参酌其他资料，以在此书中出现的人物为中心，进一步探讨有关马共干部的实态。

本文使用的附加在姓氏前的 ■ 标记为逮捕后被杀害者；□ 为逮捕后投降者；（ ）内为笔者的注记；[ ] 内为原著所有的附记或注记。

## （一）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

### （1）黄绍东（莱特）

就抗日运动时期的马共最高干部莱特已有很多记载，大多都认为莱特是1934年末来到马来亚，35年进入马共领导核心，39年就任马共总书记。马共自己也说莱特“1935年利用党内混乱之机，伪装成第三国际的代表潜入了党内，并在39年篡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地位”。<sup>④</sup>但在1966年曾出现另一新说，此说声称“1931年新加坡码头工人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青年领袖，马共同他接触时，他自称是第三国际派遣而来的莱特。此人很快就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sup>⑤</sup>但此说最终并没能推翻以往的一般通论。

日本占领时期，他任马共霹靂州地委及第六独立队干部，战后任马共柔佛州代表。1946年至48年初就任该党驻新加坡代表的张明今(Chang Ming Ching、Zhang Mingjin)指出：“莱特在1937年实际上就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sup>⑥</sup>

④ 《马来亚共产党略史》，收在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编，《东南亚诸国共产党重要声明集》，1975年版（下略为《马共略史》），页3。

⑤ 陈家驹，《马来亚共产党的真面貌》，收在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机关报《导报》，1966年7月号。

⑥ 张明今先生给笔者的书信（1993年3月28日）。关于张氏情况，请参考《亚洲经济》第33卷7号中笔者的《马来亚共产党原干部会见记》。



马来亚被占领时期的日本方面的资料把战前马共最高领导人莱特称为黄绍东（北京语为：Huang Shaodong；越南语为：Hoang Thieu Dong）。<sup>⑦</sup>在研究马共最基本文献的 Hanrahan 一书中，则把此黄绍东简单地说成是“被认为是三十年代初期的领袖”，而且把 Huang Nalu（不是 Huang Shaodong）说成是莱特的别名。<sup>⑧</sup>“Huang Nalu”一称据推测可能是中文或日文翻译者错把（17）的黄耶鲁（Huang Yelu）的“耶”理解成“那（Na）”所致。<sup>⑨</sup>由此可见此书中的莱特即 Huang Nalu 之说存在着两种错误。

另外一些像 Lao Wu（老吴？）、Wright、Li Tek（李德？）、<sup>⑩</sup>亚列（Yalie）、<sup>⑪</sup>黄金玉<sup>⑫</sup>等化名是否就是莱特，真实情况至今不详，但新加坡的越南人社会中的通称黄阿岳（越南语为 Huang A Nhac）是其真实姓名的可能性最大。<sup>⑬</sup>

据自莱特被捕后到日本战败时为止，作为特务利用了莱特的原日本宪

⑦ 筒井千寻，《南方军政论》（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44），页 150，154-5。

⑧ G.Z. Hanrahan,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 p. 231.

⑨ 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曾作为“马来军政监部调查部员”驻在马来亚，现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板垣与一，于战后 1946 年 7 月作为俘虏被关押在新加坡时，英军保安队长命令他翻译战后日本宪兵队在联合军刑务所内编辑的大量有关马共的文书。板垣与一教授就当时的情况，曾在其著作中这样回忆道：“我对他们要求说：‘此报告书中载有很多支那（sic）人姓名。因我不懂支那语，无法准确表记这些人名的拼写法，所以我派一个懂英语的支那人作助手。’于是我和赤松勇教和专负责人名表记的“支那人实业家”3 个人开始了翻译，翻译一共用了 10 天时间”。见《与亚洲的对话》（论创社，1988），页 188-91。

Hanrahan 似乎利用过翻译的此文书，在 Hanrahan 的书中，面目不明的马共干部 Che'n Chia Keng（实际上是陈嘉庚 Tan Kah Kee 的北京语拼音法）出现，也是由于此翻译的误记所致。导致这种情况，是由于帮助板垣与一翻译的“支那人实业家”不愿意协助英国当局，故意回避名字的正确拼写法，还是由于当时时间紧迫，无暇一一确认，事到如今已无从获悉。

⑩ John Cross, *Red Jungle* (London: Robert Hale Ltd., 1957), p. 94.

⑪ 根据大西原队长对笔者的叙述（1978 年 5 月 31 日）。

⑫ 筱崎护，《新加坡占领秘录》（原书房，1976），页 168。

⑬ 参考笔者的〈马来亚共产党原干部会见记〉。



兵队长大西觉（隶属第二野战宪兵队）说，莱特是在1942年3月上旬或中旬被捕的。日本当局把他拘留了15天或20天左右后始释放他，让其活动。<sup>⑭</sup>莱特被捕是因为两三个被抓起来的共产党员供出了他。<sup>⑮</sup>莱特被捕后马上就比较痛快地坦白说出了自己是英国侦探局的间谍和马共干部，由于他“为保性命有意当间谍”，所以日本方面决定反过来加以“利用”。由于当了日本谍报员的莱特“很卖力地收集情报”，所以大西宪兵队“对共产党的动向了如指掌”。大西宪兵队逐渐地也“开始尽量尊重谍报员（莱特）的意见，逮捕马共党员时，如莱特提出此人马上被逮捕，对我（莱特）也不会出多大问题，宪兵队就会马上抓，反之，如莱特要求不要马上逮捕某人，稍微拖一段时间，宪兵队也会听从他的意见暂时等待，寻找合适的机会。”<sup>⑯</sup>大西说莱特“这个谍报员真正作为宪兵队的特工进行了活动是到43年前半年为止，……43年末以后，由于我们的败势逐步明显的缘故，他当了双重间谍的嫌疑很大。”<sup>⑰</sup>

从上述这些有关人员的叙述可知，莱特不仅仅是单纯的日本间谍，他与俄罗斯革命前夜时期的 E.F. Azev (1869-1918) 很相象，出卖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同时对当权者加以痛击。1943年中期以后，莱特就马共干部向日

<sup>⑭</sup> 《特定研究“文化磨擦”·D.日本军政6·采访记录》（东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国际关系论研究室，1980）（以下略为《日本军政》第二集），页42。

亲自听取了叙述的明石阳至教授在别稿中说：中山三男原宪兵曹长讲“逮捕是在1942年3月10日前后”，大西原队长说“从逮捕到释放为止的审讯期间为15至20天”，“释放是在3月10日以前”，筱崎护（参与“昭南华侨协会”成立计划）则讲“莱特是在2月16日自己出面的”。研究了这些诸说之后，明石教授得出了“3月初或中旬被逮捕，同月末前释放”的结论。Yoji Akashi, “Lai Teck,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9-1947,”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49 (1994), pp. 70-1. 黄耶鲁说3月31日莱特去过他家（见注27），因此莱特应该在3月末前就被释放了。

<sup>⑮</sup> 大西觉，《秘录昭南华侨肃清事件》（金刚出版社，1977），页153；根据该氏对笔者的叙述。

<sup>⑯</sup> 同上书，页177-9。

<sup>⑰</sup> 同上书，页178。

本方面提供的情况开始减半，马共的战斗力的这个时期开始稳健地增强。另外就中央军委主席刘尧(Lau Yew)和战后的马共总书记陈平(Chin Peng, 曾于1943年作为马共霹靂州总部代表与John Davis、林谋盛Lim Bo Seng——英国派遣进来的136游击部队指挥官——进行过交涉，已在党内显露头角)两人的情况，莱特没有向日本宪兵队提供过任何情报，据说大西宪兵队长甚至连两者的存在都不得而知。<sup>⑮</sup>不过根据《选辑》记载，刘尧在就任第一独立队“管理部”负责人时，曾于1942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审讯时受到了酷刑拷打，但他在吉隆坡郊外服苦役时，趁监视的人不注意时逃了出来。<sup>⑯</sup>《选辑》中，没有明确记载出卖他的叛徒的姓名，如果是莱特的话，就会载有他的姓名，所以此事不是由于莱特出卖所致。也许是由于刘尧被抓时，他用的是化名，日本宪兵队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莱特也不敢让大西原宪兵队长知道，因此大西对刘尧确是毫无所知，因为大西原宪兵队长叙述时已时隔战后20年之久，他无需就此再做伪证。

当时的莱特路线是莱特根据自己的所谓“革命”蓝图及战略制定的，并经过全体马共同意，而且他的路线在与日本军作战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是不能否定的。如果说挫折失败全都是莱特的叛变行为所致，而取得的战果全都是其他党员共同努力，战胜了莱特的错误路线所取得的，这是不具说服力的。就当时的路线进行评论时，莱特是不是特务并不怎么重要，莱特确实是特务，但马共的路线和战略全因莱特充当了间谍而被歪曲的观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就战后莱特在自己的身分暴露后逃走时的经过，已有很多研究，在此仅就至今未曾接触过的一些事实加以论述。

1945年12月1日抗日军把武器交给了英国方面，并宣布解散。而在重新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时，刘尧就任了其会会长。<sup>⑰</sup>一年

---

<sup>⑮</sup> 根据大西原队长的叙述。

<sup>⑯</sup> 《选辑》，页386-7。

<sup>⑰</sup> 《南侨日报》，1946年12月3日。



后，在1946年12月20日至22日召开的该会第二次大会上，张红（即莱特）被选为会长，陈平（1947年以来为党总书记）和刘尧（秘书处兼务）被选为副会长，<sup>②</sup>这意味着莱特也是党的军事部门的最高权力者。但在1947年2月初旬刘尧曾以退伍同志会“主席”的职称，向英国当局提交过书信，要求支给在抗日战中负伤了的原抗日军士兵未付的薪水和补偿金。<sup>③</sup>同年4月1日刘尧任该会会长的事实得到了证实。<sup>④</sup>由此可以推测，在此期间莱特在党内的位置已出现了什么异常变化。但是张明今却坚持说退伍同志会的实质领导人始终都是刘尧，否定上述看法。<sup>⑤</sup>

**■ 黄成 (Huang Cheng)，又名黄诚（马共方面的资料常用这个“诚”字）、黄石 (Huang Shi)**

福建省出生（见补注1）。30年代后期，与王炎之（Ong Yen Chee，1934年由中共派遣前来领导马共）等人一起，负责编辑霹雳州怡保的左派报纸《华晨报》。1942年4月被莱特出卖被捕。当时，如图表所示，他就任中央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就这一事实《选辑》也有明确记载。黄成于1942年8月9日死在狱中，他的妻子李明（Li Ming）与他同时被捕后，被日本军判处15年徒刑。据说李明在狱中，曾怀疑党内高级领导人中有内奸。《选辑》就此事曾反省说：“如果当时每个同志路线觉悟高，有较高马列主义水平，是有可能发现和提供重要线索的。”李明战后被开除出党。<sup>⑥</sup>

事隔多年后，马共在自己编写的马共简史中指出，作为“抗日战争中战死的优秀领导同志”的中央常务委员有 Lim Kiang Soo、Lee Liang 和 Huang

① 《南侨日报》，1946年12月27日。

② 《民声报》，1947年2月5日；《南侨日报》，1947年2月8日。

③ 《南侨日报》，1947年4月1日；《民声报》，同年5月10日。

④ 张明今给笔者的书信（1995年5月16日）。

⑤ 《抗日军》，页379；《选辑》，页286，296，323-4，335，464。

据《抗日军》记载，1942年1月设立的第三独立队司令部管理部主任为李明（李镜明），二人是否同一人物不明。页213。

Soong, ② Huang Soong 就是黄成。Lim 是林江石, Lee 是白衣的别名, 即李良 (详见后叙)。

原昭南宪兵队曹长中山三男说, 中共派遣的马共干部不只是黄耶鲁和客民, 黄诚也是其中的一个 (根据 1998 年 9 月 17 日给笔者的书信)。

**3** 阿年 (A Nian), 又名郑亚宁 (Zheng Yaning)、林义生 (Lin Yisheng)、郑声烈 (Zheng Shenglie)

出生于柔佛州麻坡 (Muar), 祖籍福建。毕业于槟城钟灵中学 (见补注 2)。曾担任马共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 1942 年被捕。黄耶鲁就他有过这样的记载: “亚宁被捕后鬼子 (日本军) 审讯他时, 曾问过他认不认识黄绍东, 使他大吃一惊, 因为黄绍东是莱特用来和中共通信的名字, 在全党中只有他和莱特知道。”亚宁在 1942 年 11 月与黄耶鲁一起被判 10 年徒刑, 并于 43 年 4 月 1 日被引渡给了大西宪兵队软禁。1944 年 1 月由于他目睹了莱特和下村友平曹长 (与莱特接头的联络员) 密会的场面, 故在同年 4 月, 日本军按照莱特的要求在柔佛新山杀害了他。③

1969 年 7 月 6 日, 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机关报《阵线报》的一篇题为《抗日英雄事迹——回忆张克夫同志》报道中, 谴责黄耶鲁和郑声烈“出卖了张克夫 (Zhang Kefu, 图表 8 的老张)”。

据《选辑》所记, 郑亚宁是麻坡人, 两个弟弟都参加了马共运动, 一个在 1944 年死于狱中, 另一个弟弟在 1949 年抗英斗争时期被驱逐出境。据说黄成在监狱中曾说过: “黄 XX (指黄耶鲁。笔者按) 和林义生是叛徒”。④ 马共的有关资料把他视为“叛徒”者也不少, 抗日军烈士名簿⑤中没有

② 《马共略史》, 页 6。

③ 黄耶鲁, 《马共中央总书记莱特, 如何杀害国共两党及联军干部》(1945 年 10 月), 收在新加坡《国际时报》, 1968 年 8 月号。

④ 《抗日军》, 页 138; 《选辑》, 页 324, 329。

⑤ 《抗日军》, 页 379-82。



其名。据张明今的说法，莱特在郑亚宁死后把其遗留下来的寡妇纳为第二位妻子。<sup>⑩</sup>

#### ④ 小中 (Xiaozhong), 又名小忠、李振宗 (Li Zhenzong)

1918年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8、9岁时随母渡洋去了父亲居住的新加坡。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檳城渡过的。1933年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加入了马来亚共产主义青年团，36年加入了马共，38年就任该党檳城市委书记，39年4月任中央委员兼新加坡市委书记（据说此时因提出了与莱特不同的意见，而曾被下放到工厂），40年就任雪兰莪地委书记，41年12月10日在党的第七届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全马来亚沦陷为日本占领地时，为恢复与地方组织关系和成立抗日军的准备工作，曾奔波于马来亚中部和北部。1942年8月31日夜在石山脚 (Batu Caves, 俗称峇都隐) 召开预备会议时（因莱特没前来出席会议，故由小中主持），突然被日军包围，与很多其他干部一起被杀害了。他是这次牺牲的干部中职位最高者。<sup>⑪</sup>1969年1月26日《阵线报》就此报道说，小中是当时的中央军事委员。

战时留下来的英国士兵 John Cross 说：“柔佛游击队干部 Ah Chong (23岁，檳城出生) 在石山脚被杀害了”。<sup>⑫</sup>他说的此人可能就是小中。日本军方面编纂的一有关治安文书《马来治安上的一考察》（以下略为《考察》）中，就此事件记载如下：“42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讨伐时，消灭了很多干部，但小平、客民、小中等马来 (sic) 共产党常务委员……等多数干部仍残存……。”<sup>⑬</sup>由此可见，日本军方面没能确认到小中是否死亡。

⑩ 根据张明今对笔者的叙述（1993年9月3日，5日）。

⑪ 《选辑》，页54，页282-96。

⑫ John Cross, *Red Jungle*, p. 91.

⑬ 军政监部警察部，《马来治安上的一考察（极秘）》，1942年11月27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德川义亲收藏）。

## 5 林江石 (Lim Kang Sek), 又名黄伯遂 (Huang Bosui)、老黑 (Lao Hei)

1916年广东省增城出生,幼时丧父随母来到了霹雳州。小学毕业后到锡矿场做工,1937年加入马共,领导了工人运动、抗日救国运动,任党霹雳州地委。1939年4月任中央委员,6月兼任雪兰莪州地委书记,40年与小中对换兼任新加坡市委书记,41年秋被英国当局逮捕,有幸于12月20日与黄耶鲁等人一起被释放后,任抗敌动员总会民众武装部主任、华侨义勇军领导。1942年2月13日义勇军解散后,同月下旬与很多居民一起被抓及接受“检证”,结果还算幸运,被无事释放了。4月初旬由于莱特出卖,他被日本军逮捕了,但他在第二天逃了出来。同月中旬,他为了就任柔佛第四独立队党代表职务与林亚当、阿邱(图表上分别是番号19、11)一起,准备马上离开新加坡的前夕,由于莱特出卖再次被捕,并于同年7月18日死于狱中。<sup>④</sup>日本方面认为林江石为“马来(sic)共产党执行委员中最有势力者”,并且承认三人被捕是由于莱特提供了情报所致。<sup>⑤</sup>战后马共系列史书中,均把他赞扬为“马来亚的人民英雄”。<sup>⑥</sup>

## 6 客民 (Ke Min), 又名蔡克明 (Cai Keming)、大黎 (Dali)

祖籍海南。开战时任党东彭亨地委书记,彭亨陷落后在中央工作。1942年5月与小中、朱老(Zhu Lao,详见后记。)等人一起出席了在北柔佛召开的中南马来亚党、军干部会议(由莱特主持)。在此会议上莱特批评第二独立队的行为是冒险主义,并决定解散这个独立队,不过由于客民、小中和老朱的共同努力,独立队在实际上总算存续下来。从同年6月开始,受莱特之命,他与朱老一起被派遣到第二独立队进行“检查”时,违抗莱特的意志,曾反对实施其错误路线。出席石山脚会议时,侥幸冲出了包围逃了

<sup>④</sup> 《选辑》,页296-312,335。

<sup>⑤</sup> 大西觉,《秘录昭南华侨肃清事件》,页154。

<sup>⑥</sup> 前记《马共略史》,页6;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中央宣教委编,《马来亚历史资料》第二集(新加坡:同阵线,1969),页13-9;林芳声,《马来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页94。上記各书均未提林江石由于莱特告密被捕一事,但把他视为“在抗日战中牺牲了的英雄”。



出来。<sup>③⑦</sup>

上記《考察》中，就此曾有这样的记载：“（马共）派遣到马来半岛的中央常务委员客民，在（1942年）9月下旬与昭南中央常务委员亚烈秘密会面，就日军讨伐状况，以及如何挽回党的势力范围，进行了商谈……”。此情报就是莱特迅速送到大西宪兵队的。

1943年4月10日他（客民）被捕。被捕后黄耶鲁被领来当面确认，<sup>③⑧</sup>此次被捕也是由于莱特出卖所致。<sup>③⑨</sup>但据 John Cross 说，由于 Mee Tek（美德？）于1943年6月叛变，导致党中央委员 Ah Chai（亚蔡？）被捕，并在审讯拷打时死亡。<sup>④⑩</sup>这里的 Ah Chai 可能就是蔡克明，而 Mee Tek 这个人物在马共方面的资料中没能确认到。据 John Cross 的说法，Mee Tek 于1943年11月去了吉隆坡，并被抗日军队队员刺死。<sup>④⑪</sup>

另外，《抗日军》和《选辑》及其他的一些马共资料，就客民的出生地、其成长情况及战前的经历，都没有任何记载，但在蔡白云原马共书记夫人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吟味的一节。他们夫妻于1937年末离开马来亚去了延安。

“1938年9月末，我在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结束后，开始做去前线的准备。在延安，我们以华侨为骨干，组成了一个海外工作团，奔赴东南亚各国从事侨运工作，支援祖国抗战。此团团团长是蔡克明，副团长为蔡白云，团员有我等20余人”。<sup>④⑫</sup>

<sup>③⑦</sup> 《抗日军》，页197-200，338；《选辑》，页54，58，286。

<sup>③⑧</sup> 黄耶鲁，〈马共中央总书记莱特，如何杀害国共两党及联军干部〉。

<sup>③⑨</sup> 《日本军政》第二集，页42。

<sup>④⑩</sup> John Cross, *Red Jungle*, pp. 121-2.

<sup>④⑪</sup> 同上书，页134。

<sup>④⑫</sup> 钟萍（蔡白云夫人），〈拳拳赤子心 迢迢奔圣地〉，收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华侨组编《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以下略为《岁月》），页137。

据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的《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此“海外工作团”的“主任”是朱德。中共中央从抗日军政大学和其他两校中选拔了一些学员（主要是华侨青年）组成此工作团。为了动员东南亚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因此派遣了此工作团。此团正副团长，是蔡克明和蔡白云（同上书，页325）。

蔡白云在1930年中期任马共书记，38年初去了延安，后作为“海外工作团”副团长去了越南，并于46年病逝在西贡。<sup>④③</sup>

在客民等马共干部被捕时负责审讯的宪兵曹长中山三男说：“我认为黄耶鲁、客民都是中共派遣来的领导干部。”<sup>④④</sup>笔者就此曾具体询问过原宪兵曹长中山本人，他告诉笔者说：“客民是为领导马共被中共派遣来的。他出生于海南岛，毕业于当地大学，在学生时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引自中山1998年9月17日给笔者的书信）。

蔡克明肩负着“支援祖国抗战”这一使命，被中共派遣到马来亚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7 雪峰 (Xuefeng), 又名李雪峰 (Li Xuefeng)、白衣 (Bai Yi)、白蚁 (Bai Yi)、李良 (Li Liang)**

广东省四邑人。原为建筑工人。在1939年4月党的第六次中央委员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5月曾作为雪兰莪州地委书记，主持过马共州代表会议。代表中央出席了这次会议的黄诚（黄成），传达了党中央的决议，宣布地委书记由中央任命，并指名林江石为后任书记。开战前夕，他在其任地霹雳被英当局逮捕，41年12月末被释放。<sup>④⑤</sup>

日本占领时，他曾在1942年4月被日本军逮捕。据《阵线报》刊载的

<sup>④③</sup> C. F. Yong,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p. 242; 周南京主编,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页851; 《岁月》, 页132-8; 张明今书信 (1993年3月28日)。

<sup>④④</sup> 《日本军政》第二集, 页12, 14。

<sup>④⑤</sup> 《选辑》, 页296, 299, 300, 338, 489。



一篇文章〈抗日英雄事迹——回忆张克夫同志〉中说，是黄耶鲁和郑声烈向日本军提供了张克夫和白衣的情报，但实际上莱特无疑是真正的情报提供者。

《选辑》中还记载着白衣在狱中写给同志一封志期为 42 年 11 月的书信，信中说多数同志都在拷问时死亡。白衣本身也在写完此信后不久死于狱中。

④⑥

**8 老张 (Lao Zhang)，又名张锦章 (Zhang Qingzhang)、张克夫 (Zhang Kefu)、张克章 (Zhang Kezhang)**

任马共雪兰莪区委委员之后，1941 年就任新加坡市委委员，42 年初任该市市委书记，42 年 4 月被捕，同年 11 月 20 日被判死刑。<sup>④⑦</sup>从《抗日军》牺牲者名簿的记载顺序判断，他在 1941 年 7 月第七次中央委员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sup>④⑧</sup>

**9 小罗 (Xiao Luo)，又名小路 (Xiaolu)、陈培青 (Chen Peiqing)**

日本方面的资料为小罗，马共方面的资料为小路，又名陈培青，两者为同一人物的直接资料至今尚未发现，但从其地位判断，似乎是同一人物。此人 1942 年被捕，同年 8 月 1 日死在狱中。<sup>④⑨</sup>

**10 亚文 (Yawen)，又名刘文 (Liu Wen)、钟步青 (Zhong Buqing)**

1920 年出生在柔佛（见补注 3），祖籍广东。作为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sup>⑤⑩</sup>委员，在林江石手下，领导过星洲华侨义勇军。1942 年 5 月出席出中南

④⑥ 《选辑》，页 334-9。

④⑦ 黄耶鲁，〈马共中央总书记莱特，如何杀害国共两党及联军干部〉；《阵线报》1969 年 7 月 6 日；《抗日军》，页 138。

④⑧ 《抗日军》，页 379。

④⑨ 《选辑》，页 286，296，335。

⑤⑩ 与 1942 年 5 月成立的“抗日军中央军事委员会”（海上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 45）无关，它是在 1941 年 12 月日本军侵略马来亚之后不久成立的（《选辑》，页 30）。刘尧当时任“抗日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机关报《战友报》，1947 年 11 月 28 日）。

马来亚党、军干部会议。曾在柔佛进行过各种活动，在因病赴新加坡疗养的途中，被同伙出卖被捕。据有关材料证明，1943年10月他被关在太平监狱，44年被判绞首刑，享年24岁。<sup>⑤</sup>

**11** 阿邱 (A Qiu)，又名阿丘 (同)、邱联杰 (Qiu Lianjie)、邱俊杰 (Jiu Junjie)

战前任新加坡总工会负责人。1942年4月中旬，和林江石、林亚当一起为执行新任务准备渡柔佛海峡时，被莱特出卖被捕，同年8月1日死于狱中。<sup>⑥</sup>

在马共方面的资料中，上述11人均均为党中央委员，没有第12名以下的人为中央委员的说法。相反的，在前述图表中，遗漏了马共资料中的身为中央委员的朱老、小平和亚仲3人。故在此就此3人的情况，简单地加以介绍（从整理角度，番号采用小林26以后的番号）。

**27** 朱老 (Zhu Lao)，又名朱日光 (Zhu Riguang)

祖籍海南（见补注4）。1942年1月4日代表马共出席了在北雪兰莪召开的第一独立队设立大会，后直到4月为止，都是骑自行车为恢复与中、北部马来亚各地组织和中共中央的联系跑来跑去。4月任第四独立队党代表，6月和客民一起被派遣到第二独立队，同年9月1日参加石山脚会议被日本军杀害。<sup>⑦</sup>

**28** 小平 (Xiaoping)，又名林旺生 (Lin Wangsheng)

1942年5月中旬，出席了在北柔佛召开的中、南部马来亚干部会议。石山脚事件发生时（当时兼任马共雪兰莪地委书记），冲破重重阻力逃了出来，但1943年4月在雪兰莪被捕。<sup>⑧</sup>

<sup>⑤</sup> 《选辑》，页20，22，27，54，324-5，331。

<sup>⑥</sup> 《选辑》，页296，299，322，335，483。

<sup>⑦</sup> 《抗日军》，页138，150，156，198，245；《选辑》，页53-9，286。

<sup>⑧</sup> 《抗日军》，页138；《选辑》，页54-9。



新马侨友会所编两本书对小平的记述是很微妙的。这两本书虽把他看作是莱特牺牲品的一位中央委员，但在《抗日军》一书卷末的“烈士英名录”中，却没有列出其名。据原马共干部张明今说，小平在1943年末被拘押时，日本军曾让他看一份曾经由他笔录提交给莱特的秘密报告，当时他以为莱特已经被捕了，而这份报告是莱特被捕时被日本军没收之物。小平逃出来之后，把此事向陈平（后为马共总书记）做了汇报，但陈平听后马上就告诉了莱特，莱特命令人把小平送往东彭亨枪杀了（根据张明今1993年9月5日的口头叙述）。张明今的证言要拿到旁证很困难，但“英名录”中没列有小平其名这一处理方法本身，似乎也说明些什么。

### (29) 亚仲 (Yazhong), 又名吴田 (Wu Tian)

出生海南（见补注5）。自1942年前半期以来，兼任马共东彭亨地委书记。他是1943年4月以后，除了莱特以外，唯一生存的中央委员。<sup>⑤</sup>

新马侨友会，也就是当事者方面所说的十三个中央委员（不包括莱特）中，也许是由于在边远地区活动的缘故，莱特只是没把他的名字透露给日本军，因此只有亚仲一人得已在日本占领时幸存下来，而其他十二人到1943年4月止，全都由于莱特出卖，被日本军逮捕杀害了。马共中央委员会事实上已被消灭，所谓的中央委员会，变成了不外是莱特一个人。

至于莱特为什么没有把亚仲、朱老和小平的名字泄露给日本军（所以没列入前述图表中）？又为什么把数名不是中央委员的人，混列入了中央委员的名簿中，现在还是个谜。

## (二) 马共地委·抗日军干部

### 12 亚业 (Yaye), 又名叶立天 (Ye Litian)、叶亚业 (Ye Yaye)

1921年出生（广东？）。中国“大革命”失败（1927年）后，随母亲来新加坡避难，他的父亲经营鞋店。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曾通过“铜

<sup>⑤</sup> 《抗日军》，页38，138-9。

锣合唱团”等音乐活动，参加抗日运动，作为革命歌曲作曲家闻名。他曾作为党新加坡市委委员，进入101特训学校，担任翻译员。1942年8月<sup>⑥</sup>马共新加坡市委干部一齐被捕后，曾作为市委书记，领导恢复党组织。所谓“不进虎穴，焉得虎子”，他曾刻苦学习日语，并曾在一个时期内打进了日本军政部，利用工作之便，向抗日军提供过情报。1943年4月11日被捕，同年6月18日被处刑，享年22岁。<sup>⑦</sup>

### ■ 小黑 (Xiao Hei), 又名王小黑 (Wang Xiaohai)

在大西《秘录昭南华侨肃清事件》一书中，有两个小黑出场，并且两个小黑都是由于莱特出卖被捕。据说在1942年4月，日本军在逮捕一个小黑时，“这个小黑拒捕，拿着手枪乱射抵抗，……被击毙”（页154），另一个小黑则在同年8月27日“在昭南市内开干部会议”时，与其他十四名领导人一起被抓（页254）。大西原宪兵队长就这两个小黑的出现，认为是小黑被打死后，另外有人冒称小黑在进行活动。<sup>⑧</sup>但据黄耶鲁说，小黑是在1942年6月30日被捕的。另外，据1969年9月14日《阵线报》报道，小黑在石山脚事件发生时侥幸逃了出来，但不久就被逮捕，并于1942年11月20日被处死。总共化名为小黑的人物，不断地出现了四人。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抗日军》，还是《选辑》，均对“小黑”或“王小黑”无任何记载，就连《抗日军》卷末的牺牲者名簿中亦无其名。

### ■ 土月 (Tu Yue) 或士月 (Shi Yue), 又名黄式锐 (Huang Shirui)

据黄耶鲁讲，黄式锐的别名为土月。<sup>⑨</sup>因此“土月”一名的出现可能是由于把“士”错记成“土”所致。在战前新加坡华侨中学时期，他任“全马学抗常委会”（全马来亚学生抗日常务委员会）最高领导，1940年领导

<sup>⑥</sup> 根据大西觉，《秘录昭南华侨肃清事件》，页253-4。在黄耶鲁的〈马共中央总书记莱特，如何杀害国共两党及联军干部〉中，新加坡市委干部一齐被逮捕于1942年6月。

<sup>⑦</sup> 《选辑》，页331-2, 360-3；黄耶鲁，〈马共中央总书记莱特，如何杀害国共两党及联军干部〉。

<sup>⑧</sup> 根据大西原队长的叙述。

<sup>⑨</sup> 黄耶鲁，〈马共中央总书记莱特，如何杀害国共两党及联军干部〉。



了雪兰莪州煤炭山 (Batu Arang) 矿工运动之后, 就任该州马共地委宣传部长, 41 年在霹雳州任地委书记时, 被英国当局拘捕。1942 年 4 月被日本军逮捕, 同年 7 月 29 日死于狱中。<sup>⑩</sup>

**⑮ 客平 (Ke Ping), 又名高克平 (Gao Keping)**

至 1940 年止任马共雪兰莪州地委宣传部长 (士月的前任), 开战时任马六甲州地委书记, 不久被捕后投降, 并按日本军指示与黄国平 (第二独立队党代表, 参加石山脚会议时被捕) 一起成立了党伪中央, 号召抗日军队投降, 并于 1942 年末以霹雳州为据点, 组织了抗英但对日合作的“昭南队”, 但以失败而告终,<sup>⑪</sup>之后形迹不明。

一曾在霹雳州进行过镇压抗日分子的宪兵队员, 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 “黄自强是由 (马共) 干部转为宪兵队的一个颇有能力的密探, .....战争结束不久, .....我送给了他不少海峡货币和金块等, .....还提供了护身用手枪, .....我们分别时真是悲痛万分。”<sup>⑫</sup>他所说的黄自强也许就是客平或黄国平。

**⑯ 炳红 (Binghong), 又名陈炳红 (Chen Binghong)、陈炳宏 (Chen Binghong)**

作为马共吉打州地委书记, 出席石山脚会议时被捕牺牲。<sup>⑬</sup>

**⑰ 黄耶鲁 (Ng Yeh Lu、Huang Yelu), 又名黄望青 (Wee Mong Chen, Huang Wangqing)**

1913 年出生在福建省厦门。半工半读就读厦门大学第一年时, 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满州事变), 于是投身参加了救国活动。无论是黄耶鲁本人, 还是中国方面的有关资料, 都没有黄耶鲁是中共党员的说法, 得到证

<sup>⑩</sup> 《选辑》, 页 314, 335, 404, 441-2。

<sup>⑪</sup> 《抗日军》, 页 45, 50, 287; 《选辑》, 页 441。

<sup>⑫</sup> 石部藤四郎, 《青春·宪兵: 下士官石部笔录》 (私家版, 1990), 页 110-1。

<sup>⑬</sup> 《抗日军》, 页 156, 351, 381; 《选辑》, 页 58。

实的就是他参加过“反帝大同盟”。据说他逃往国外（1935年）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他途经缅甸、美里（砂朥越），于1936年进入新加坡后，一边执教，一边参加左翼活动，主要从事文化工作。

1938年他加入了马共，并在同年7月“马来亚抗敌后援总会”正式成立大会（抗援会成立日期应为1937年8月，<sup>④</sup>大概是到38年7月为止停留在各州个别组织建设上）上，被选为5人常务委员中的1人。同年秋天，黄耶鲁当了槟城《光华日报》的记者，领导了北马来亚的抗援会。1941年5月被英国当局逮捕，但在同年12月20日日本军南下马来半岛时被释放，后负责推动华侨义勇军成立工作。<sup>⑤</sup>

日本方面有关资料把他记载为“报纸杂志撰稿人，在新加坡文化界颇为活跃的一分子”，<sup>⑥</sup>“马共干部中，最有学问的知识分子”。<sup>⑦</sup>

日本占领时期，他从事过地下活动，但在1942年4月8日逃往柔佛前夕，为接受指示等候莱特时，被莱特出卖被捕，并在11月20日被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当时被带到法庭一共有六个人，即前记的老张、白衣及陈力奋（Chen Lifen、新加坡地委）3人被判了死刑，黄耶鲁和郑亚宁被判10年徒刑，剩下的一人（被称为小弟弟，可能是少年）被判无罪释放。黄耶鲁和郑亚宁身为马共干部，却没有被判死刑是一个极端的异例，这次判决军事法庭似乎是有意向人显示黄耶鲁和郑亚宁是情报提供者。据黄耶鲁自己讲，干部不断地被捕，马共党员之间开始对莱特产生了怀疑，为了把这种怀疑在萌芽时期就铲除掉，便把提供情报的罪责转嫁给他和郑亚宁两人，给外人造成一种他们是叛徒的错觉，日本军和莱特便导演出这场戏剧性的裁判。<sup>⑧</sup>

<sup>④</sup> 据《选辑》（页397），1937年8月成立筹赈会的同时，新加坡、雪兰莪、柔佛、马六甲、霹雳、槟城等各州和市都成立了抗援会。

<sup>⑤</sup> 黄耶鲁，〈马共中央总书记莱特，如何杀害国共两党及联军干部〉；李立夫编，《从鼓浪屿到新加坡——一位外籍华人的历程》（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页35-78；前记《世界华侨华人词典》，页724。

<sup>⑥</sup> 胡迈著，井田启胜译，《华侨新生记》（新纪元社，1944），页107。

<sup>⑦</sup> 大西觉，《秘录昭南华侨肃清事件》，页187-8。

<sup>⑧</sup> 黄耶鲁，〈马共中央总书记莱特，如何杀害国共两党及联军干部〉。



据大西原队长说，特别警察队在1943年初给黄耶鲁“办理了从刑务所出来的假释手续，带走了他，……把他软禁在队里，让他为宪兵队从事共产党研究及情报审查等”，但就干部的个人情报，从他那儿几乎毫无所获。<sup>①</sup>马共把黄耶鲁视为“叛徒”，并宣判了其死刑，莱特也有恐于自己的特务行为被暴露，要求大西队处理掉黄耶鲁，但最终黄耶鲁幸而得免于来自任何一方的死刑，并于战后1945年10月，以他在被拘留软禁时得到的情报为根据，写了辩明书——揭发莱特的告发书，寄给了有关人员，但当时莱特在党内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根本不是党能接受黄耶鲁这份澄清自己的文书，替自己申冤的时期。《选辑》就黄耶鲁的战前活动所记载的几处地点，都是使用实名，就其战时行为叙述时，则是用“黄XX”这一词语。<sup>②</sup>

黄耶鲁后改名为黄望青，进入了实业界，并从1973年起至80年止，任新加坡驻日大使，并以其凛凛大使形象，被人周知。80年代中叶，他似乎与新加坡政府之间发生了纠葛，现住香港。近年他的传记在他的家乡厦门出版了，<sup>③</sup>这意味着他被公认在拘押时没有叛变行为。

#### (18) 李安东 (Lee Aun Tong、Li Andong)

祖籍潮州。<sup>④</sup>“民众武装部”领导人之一，<sup>⑤</sup>原“第一独立队”党代表吴亮明 (Ng Leong Meng) 说李是“党中央委员，隶属于宣传部。他与莱特关系非常密切，两人似乎能够畅所欲言。在抗日军内的知名度仅次于莱特”。<sup>⑥</sup>他的姐姐李琼 (Li Qiong) 是第六独立队公开部队部长汪清 (Wang Qing) 之妻，<sup>⑦</sup>战后1955年就任马共副书记长。1961年1月离开马来亚潜伏

<sup>①</sup> 大西觉，《秘录昭南华侨肃清事件》，页187-8。

<sup>②</sup> 《选辑》，页19，303，329等。

<sup>③</sup> 李立夫编，《从鼓浪屿到新加坡——一位外籍华人的历程》。

<sup>④</sup> 根据张明今的叙述（1993年9月3日，5日）。

<sup>⑤</sup> 《选辑》，页20。

<sup>⑥</sup> 根据原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党代表吴亮明对笔者的叙述（1994年9月4日于新加坡）。

<sup>⑦</sup> 根据张明今的叙述（1993年9月3日，5日）。

到曼谷，同年12月去了北京后，与同年中期去了北京的陈平总书记等人，一起在北京领导了马共活动。他的夫人 Tan Ling (陈玲?)，又名 Lim Chan (林珍?)，在1951年就去了北京，<sup>⑥</sup>但60年代末党“北马来亚局”（最高负责人为张峰云，又名阿苏，该局书记）肃清时，其夫人被杀害了。“之后李安东本人，也被陈平拉下台”。<sup>⑦</sup>1989年和平协议缔结后，他移居去了泰国南部马共迁移地“和平村”，现年事已高，耳朵也背，已“靠边站”（引自吴亮明1998年1月10日寄给原的信件）。

#### ■ 林亚当 (Lin Yadang)

祖籍福建。1916年或1917年出生在新加坡，码头工人出身。作为马共新加坡市委委员领导过抗敌后援会，被英国当局逮捕。1941年12月20日与林江石、黄耶鲁等人一起被释放后，负责领导星洲华侨义勇军工作。与林江石一起在“检证”时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但在1942年4月14日与林江石一起为前往执行新任务渡柔佛海峡时被捕，在狱中虽受酷刑，却始终保持沉默，拒不答复。同年7月31日，用玻璃碎片割断了手腕的动脉自杀。<sup>⑧</sup>

#### (20) 老陈 (Lao Chen)

据推测此人可能是第一独立队初任队长，1943年初因奸细密告被捕并被杀害的陈天庆(Tan Thian Kheng、Chen Tianqing)，<sup>⑨</sup>或马共雪兰莪州地区委员陈石(Chen Shi)，<sup>⑩</sup>或第一独立队公开部队副队长，战后抗英武装斗争

<sup>⑥</sup> Aloysius C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Inside Story* (Kuala Lumpur, Vinpress, 1994), pp. 46, 69, 90-2.

<sup>⑦</sup> 根据张明今的叙述(1993年9月3日, 5日)。

<sup>⑧</sup> 金星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星洲华侨义勇军〉, 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第19辑, 1980年6月, 页71-2, 82, 86; 《选辑》, 页19, 296-9, 306, 310, 322, 335。

<sup>⑨</sup> 《抗日军》, 页150, 157-8。

<sup>⑩</sup> 《选辑》, 页376。



中被英军逮捕，并于1959年被驱逐出境强行送回中国的陈大智 (Chen Dazhi)，<sup>⑩</sup> 但没确凿证据。

### (21) 杨木 (Yang Mu)、又亚科 (Yake) 和亚森 (Yasen)

柔佛州天吉港 (Tengkil) 抗日总会负责人，马共南柔佛地委。1944年10月曾出席过在吉隆坡郊外召开的党军高级干部会议，此时已转任雪兰莪地委委员。<sup>⑪</sup>

### 22 陈全 (Chen Quan)

据推测此人为槟城地委书记，也就是石山脚事件时被杀害的陈文燕 (Chen Wenyan)。<sup>⑫</sup> 马共组织概要图表中位于陈全右侧“槟城地方委员会委员长”小罗，真名是陈培青。由于当时马共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组织，都没有“委员长”之职，“委员长”被认为就是地委书记，所以陈培青和陈文燕有可能是同一人物，但是因为在《抗日军》牺牲者“英名录”中，陈培青被记载为中央委员，陈文燕被记载为吉打、槟城的烈士，<sup>⑬</sup> 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人。

### (23) 亚廖 (Ya Liao)

据推测此人就是在石山脚事件中被杀害的张奇生 (徐青)。又据说，亚廖是担任了第五独立队党代表的廖伟中 (Liao Weizhong)。<sup>⑭</sup> 廖伟中战后就任了霹雳退伍同志会会长，并在1948年7月武装斗争开始不久被捕。

### 24 除生 (Chu Sheng)

“除”这一名字，恐怕在中国人中是轻易不会使用的。此名可能是来自

⑩ 《抗日军》，页149，173。

⑪ 《抗日军》，页247；《选辑》，页261-3；亚竹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香港(?)，1992，页64 (该书来自新加坡历史家陈松沾 C.C. Chin 先生)。

⑫ 《抗日军》，页156，381；《选辑》，页371。

⑬ 《抗日军》，页379，381。

⑭ 《抗日军》，页285；《选辑》，页6。

日本人审讯记录时的错误，也有可能是印刷时选字员误拣而引起的错误。从日语发音和其任地霹雳州来看，此人可能是开战时党霹雳州地委委员，第五独立队初任党代表徐清(Xu Qing)(此二名日语均是 Jo Sei)。徐清又名张奇生(Zhang Qisheng)、张浪萍(Zhang Langping)，在石山脚事件中遇害。<sup>⑥</sup>另外，1969年1月26日《阵线报》中记载的许青(Xu Qing)，可能也是他。

(25) 小张(Siu Cheong、Xiao Zhang)，又名章传庆(Zhang Chuanqing)、张峰云(Zhang Fengyun)、阿苏(Ah Soo、A Su)、林文(Lin Wen)、章凌云(Chang Lingyun)

祖籍福建，学生出身。1941年12月末，与后成为第六独立队公开部队队长的江清(Wang Qing)一起被释放后，返回了上彭亨(西彭亨)，着手游击队的组织建设。任1942年2月成立的“上彭亨人民抗日军”的政治部主任(该军党代表黄春(Huang Chun)于1943年左右被捕)，在石山脚事件中腿上中弹，被同志背回了部队。从1943年8月该军改组为第六独立队后，直到战争结束，任该队党代表。<sup>⑦</sup>

马来西亚警察“政治部”(Special Branch)职员A.Chin在退休后所著书中，就马共的内幕情况指出，名为Siu Cheong、又Ah Soo与Chang Lingyun、Lin Wen(汉字写法均不明)的活动非常频繁。另外，张明今在与原(作者)见面时，说上記汉字名全都为同一人物。马来西亚的汉字拼法，与北京的拼音不一样，不过Chin和张明今所说的人物，毫无疑问是重复的同一人物。小张战后的行迹如下：

1953年4月前往北京就任马共驻中国事务所代表。并在1955年在华玲(Baling)与政府之间的和平会议之前召开的马共中央扩大委员会上，在驻北京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任排列第三的政治局委员(仅次于陈平、李安东)，并与穆沙·阿默德(Musa Ahmad)党主席一起作为马共代表，出席了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

<sup>⑥</sup> 《抗日军》，页281，285；《选辑》，页5，58，315。

<sup>⑦</sup> 《抗日军》，页34，311，314，316，331；《选辑》，页6，55，188，489。



第二十届大会，以及同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会议、58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届大会。1961年至63年以Lin Wen之名驻在河内，64年中期返回了泰国、马来西亚国境，指挥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十二支队。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作为党的北马来亚局最高领导（书记），领导了第八、十二支队的大批肃清工作，这次肃清导致了党和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分裂成了三派。1989年2月作为马共主席代表（当时在党内任副书记或代理总书记）出席了在普吉岛（泰国）召开的马共和泰国、马来西亚两政府之间的和平会议。同年5月患病，在北京医院死亡。<sup>⑧</sup>

据反陈平派的资料，小张因为出卖和杀害了第八支队的很多同志，与陈平一起受到了谴责。<sup>⑨</sup>作为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共和抗日军领导，其在战后的辉煌经历仅次于陈平。

#### (26) 小林 (Xiao Lin), 又名吴梦超 (Wu Mongchao)

1937年成立的“槟城抗敌后援会总会”常务委员（5人）之一，任马共北柔佛地委委员，自42年末任第三独立队党代表，44年10月出席了在吉隆坡郊外召开的党、军高级干部会议。<sup>⑩</sup>

在此提出的马共中央、州干部28人（不包括莱特）中，有18至19人被日本军杀害，2人被迫当了日本军的帮手，平安活下来的不过只有6至7个人。

另外，因为莱特而丢掉性命的不只是马来亚人。据张明今讲，战争中曾

<sup>⑧</sup> Aloysius C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Inside Story*, pp. 17, 46, 49, 64, 94, 131, 190-96, 206-27, 241; Ratanachaya Kitt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Malaysia and Thailand -- Truce Talks Ending the Armed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Bangkok: Duangkaew Publishing House, 1996), pp. 34, 51, 58, 108, 143, 182, 221.

<sup>⑨</sup> 晴朗，《伪装必须剥去！——彻底揭露陈平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澳门，1987），页54-61。

<sup>⑩</sup> 《岁月》，页222；《抗日军》，页220；《选辑》，页261-4。

有几个隶属于“日本反战同盟”投降过来的日本兵也全都被莱特命令枪毙了，因为莱特有恐于日本兵或许会知道他是日本特务。<sup>①</sup>

### (三) 其他重要干部

可能因为是莱特的心腹，莱特没有让日本军知道其存在的有势力的地委，或虽在党内不任地委（或州委）委员，但在抗日军内作为独立队党代表、作为优秀的军事领导人被赞誉的人物中，有以下4人。

(30) 陈平 (Chin Peng、Chen Ping)，原名王文华 (Ong Boon Hua、Wang Wenhua)

1924年出生于霹雳州实兆远(Sitiawan)（见补注6），祖籍福建省福清。1940年加入马共，日本占领时期任马共霹雳州地委委员、地委书记，并负责与136部队的联络工作，但在抗日战争中，党内知道他的人很少（见注95）。陈平本人最近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1942年）2月15日建队时，我是霹雳州人民抗日军第四队党代表……，6月被提拔为州地委”（见1998年6月21日《光明日报》）。他所说的第四队，应该是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四中队。但令人不解的是，《抗日军》和《选集》两书中，陈平或他所说的化名（陈金生、王平、老陈……《星洲日报》1998年6月20日），作为“第四中队”的领导，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他在1947年5月任马共总书记，<sup>②</sup>61年以后在中国领导党组织。<sup>③</sup>

自“六独”队设立（1943年8月）时起就任政治部主任（仅次于党代表、队长、副队长的地位）的也是陈平，又名赖文明 (Lai Wenming)，<sup>④</sup>但

<sup>①</sup> 张明今给笔者的书信（1996年2月25日）。

前记石部藤四郎著书中有霹雳州太平宪兵分队的前田光雄宪兵军曹逃出了宪兵队，参加了抗日军第五独立队，但战争结束后仍行迹不明的记载（页124-7）。前田军曹也许也被莱特命令处刑了。

<sup>②</sup>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页432-3。

<sup>③</sup> Aloysius C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Inside Story*, pp. 68-70, 90.

<sup>④</sup> 《抗日军》，页316, 334。



据说这是同名的不同人物。<sup>⑤</sup>

### ③① 赖来福 (Lai Lai Fook、Lai Laifu)，又名杜龙山 (Du Longshan)

1922年出生于霹雳州实兆远（出生地与陈平相同）。1937年上“南华中学”时，作为该市“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毕业后任新闻记者。1939年加入马共，40年任霹雳州南区区委委员，41年领导了锡矿工人运动，培养了其后任马共马来人最高干部拉昔迈丁 (Rashid Maidin) 等人。同年中被捕，12月20日被释放，并在同月被党中央选中进入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同时在同月就任“第二独立队”队长，1942年1月就任该队党代表，同年7月任“五独”队长，43年中期，由于内部特务的出卖被捕，被处斩首刑。<sup>⑥</sup>

⑤ 根据“第六独立队”中队干部陈瑞瑶 (Chen Ruiyao) 先生对笔者的叙述 (1994年9月4日于新加坡)；“六独”政治部主任陈平 (赖文明) 的前任，吴亮明 (Ng Leong Meng) 先生给笔者的书信 (1997年12月9日)；据吴亮明讲赖文明现在仍健在新加坡。另外，吴亮明和陈瑞瑶两人都说他们战时没听说过后任的总书记陈平这个人。据张明今给原的书信 (1997年12月13日)，赖文明在槟城做地下工作时被日本军逮捕了，但他逃了出来，在彭亨从事任务。

⑥ 《选辑》，页312-7。

关于逮捕赖来福，Yoji Akashi,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Perak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45” in Kratoska (ed.), *Malaya and Singapo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5), pp. 97-8, 115, 以及田村秀行, 《军政下的霹雳州警察——太平洋战争记录》(私家版, 1980), 页94-6中都有记载, 但田村没有涉及处刑一事。

因给游击队员治疗, 而被告密拘押在同一怡保刑务所的女医生 Kathigasu (由于拘押时的严刑拷打的后遗症, 1949年溘世), 就此这样写道: “警察署长亲自从牢中把赖来福押到了郊外, 砍下了他的头”。Sybil Kathigasu, *No Dream of Merc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1-2。怡保警察署长 (长安守) 在战后审判战犯时被判死刑 (田村秀行, 《军政下的霹雳州警察——太平洋战争记录》, 页57, 234-5)。

另外, Kathigasu 夫妻和其幼女就拷问一事, Ahmad Murad Nasaruddin 著名的马来语小说《刺刀前的生命 (Nyawa di Hujung Pedang)》(收在笔者编译, 《马来西亚抗日文学选》(劲草书房, 1994)。今仁直美译) 中有所记载。这本小说中记载着如没收战前实业家及抗日运动领袖梁桑南 (Leong Sin Nam, 1880-1940) 的公馆, 作为宪兵队总部, 和以残忍、让人闻风丧胆的宪兵军曹 (在此书中以真实姓名出现), 在审判战犯时被判处死刑等很多历史事实。

## (32) 刘尧 (Lau Yew、Liu Yau), 又名刘昌标 (Liu Changbiao)

1915年出生于海南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6年为逃避国民党的追捕,去了新加坡,37年7月参加了抗敌后援会,领导了店员部门的活动。1940年2月加入马共,41年12月进“101特别训练学校”学习,42年1月“一独”成立时,就任该队司令部管理部负责人。同年10月被捕,但后来逃了出来。1943年初就任“一独”队长,44年初就任该队党代表。在这期间,就任42年5月成立的抗日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战后历任1945年12月1日抗日军解体后成立的“退伍同志会总会”副会长、主席、会长。1948年7月抗英武装斗争开始仅一个月后战死。<sup>⑨</sup>

## (33) 陈田 (Chen Tian), 原名高才杰 (Gao Caijie)

1923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省澄海。幼时随祖母回归中国,12岁时返回新加坡。1941年加入马共,44年初任“四独”队长,战后任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机关报《战友报》主编,52年任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宣传部主任,并参加了55年召开的华玲会议,<sup>⑩</sup>61年去了中国,<sup>⑪</sup>90年在中国逝世。<sup>⑫</sup>

## 结束语

## (一)

由于莱特的出卖,致使几乎全部的抗日战争初期时的马共和抗日军最高干部惨遭日军杀害,使马共的抗日斗争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但到了1943年后期,马共的抗日战争在广泛的马来亚人民的支持下,以势不可挡之势又发展壮大起来了。当然如果没有莱特的出卖,马共的抗日战争会更加强

<sup>⑨</sup> 《选辑》,页385-8。参见莱特一项和注50。

<sup>⑩</sup>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页433。

<sup>⑪</sup> Aloysius C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Inside Story*, p. 90。

<sup>⑫</sup> 根据张明今的叙述(1993年9月3日,5日)。



大，但以此简单地断定莱特始终都在死心塌地为日本军，和为帮助日军消灭抗日军效劳也是不可取的。对于莱特，日本军也曾经感叹地说：“此谍报员（指莱特），真正作为宪兵队的帮手进行了谍报活动，是到1943年前半期为止……，43年后期以后，由于日本败势明显，他当了双重间谍的可能性极大。”<sup>⑩</sup>

另外，就战后马共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却始终没能把抗日战争转化为抗英战争这一点，有观点认为是由于莱特当了英国间谍所致，但是这种观点有些过于牵强，在几乎所有的马共和抗日军都认为应该开展抗英战争的情况下，但莱特却以强权和阴谋推行了和平路线的说法，反映不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就此问题，《抗日军》一书中有这样的评论：

“莱特的……罪行确实骇人听闻。但如果把这个内奸看成能呼风唤雨，能扭转历史航向的人物，那就错了，凡是鬼魅不能见太阳，莱特只有伪装革命才能掩饰其奸细面目，继续其破坏阴谋。……他只能暗中破坏，却无法阻止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sup>⑪</sup>

应该看到，不管当时的历史是呈什么形态发展，最终形成巨大洪流的主要力量来自群众，这不是莱特所能左右得了的。

《抗日军》进而还具体就当时的抗战情况评论道：

“造成马来亚抗日战争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最根本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在当时形势下，马来亚自身实现独立的条件尚不完备；第二，作为抗日战争领导核心的马共内部存在严重的问题，造成指导上的失误；第三，英国政府坚持殖民统治政策，顽固地镇压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要在日本投降以后，立即建立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具备各种条件，首先是必须形成对三族人民都具有号召力的、为三族人民共同支持的、能立即率领人民从抗日战争转变为独立运动的具有政权性质的统一机构。但由于三族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上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样的局面当时尚未形成。……华

---

<sup>⑩</sup> 大西觉，《秘录昭南华侨肃清事件》，页187。

<sup>⑪</sup> 《抗日军》，页140。

族.....当时绝大多数人仍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日本对中国进行罪恶的侵略战争，早已激起了他们的抗日热情，掀起了强大的抗日爱国运动。.....马来族.....除少数与华族较接近的人士之外，对人民抗日军多采取同情或中立态度。.....印度人.....的“侨民”思想比华族更浓厚。他们仇视英殖民当局，更盼望印度取得独立。.....马共和抗日军那时对印族中的情况所知不多，没有做好各民族的统战工作。<sup>⑩</sup>

另外，根据《星洲日报》1998年8月15日报道，当时莱特主张不应该展开抗英战争，“陈平承认当时他们的确信服莱特的分析”。确有少许领导人主张开展抗英战争，但马共总的看法甚至陈平本人都认为，不是莱特叛变行为的影响，而是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马上开展抗英战争。

## (二)

从马共“当事者”方面的资料，就其干部出生地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明确得知以下几点。

中国出生者，十三个马共中央委员（除去莱特）中已被证实的有黄诚、小中、林江石、客民、雪峰、亚仲六人。“马来亚共产党组织概要”图表中的中央委员以外的干部中，则有亚业、黄耶鲁二个，因此总共二十八人中有八个人生于中国。相反有证可据出生在马来亚的，二十八人中只有三个人（阿年、亚文=刘文、林亚当）。

与这二十八人不同，出生地明确的抗日军干部七人中，三人（赖来福、陈平、陈田）生在马来亚，四人（刘尧、吴亮明 Ng Leong Meng（“一独”党代表）、曾冠彪 Zeng Guangbiao（“二独”党代表）、庄清 Zhuang Qing（“七独”党代表）出生在中国。另外，中央委员、军干部、队员总括列记在新马侨友会一书内作为“烈士”中的小中、林江石等10人出生在中国，出生马来亚的只有2人（赖来福、家雷 Jialei，又名方琼生 Fang Qiongsheng（“四独”党代表）。<sup>⑪</sup>

<sup>⑩</sup> 《抗日军》，页134-6。

<sup>⑪</sup> 《选辑》，页282-95；张明今先生1993年7月24日给笔者的书信。



总括上記各项，去掉重复部分，马共和抗日军干部中，出生地有据可证的 25 人中，18 人中国出生，7 人马来亚出生。

除此之外，第五、第六独立队干部、战后当了马共新加坡代表的张明今，1920 年出生在广东，36 年前往马来亚。<sup>⑩</sup>第一独立队干部，战后 1945 年任马共雪兰莪代表的彭少雄（Phang Sau Shoong）出生雪兰莪州新古毛（Kuala Kubu Baru），1946 年 5 月 21 日死亡。所以他是个道道地地的“侨生”。尽管如此，战前 1939 年雪兰莪惠州会馆（惠州在广东省，作为客家的故乡为人周知）招募参加祖国抗日战争者时，他参加了该会馆组织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去了中国。<sup>⑪</sup>

由此可见，大部分马共和抗日军干部都是中国出生，与中国有着强烈的精神纽带及连带感和归属感，是 30 年代后期的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共同目标，把他们连结在一起。而且中央委员之一客民是中共中央直接派遣到马来亚的可能性极大，而军事部门的负责人刘尧在进入马来亚之前，就已经是中共党员。

就两组织党员和一般队员，可以加以肯定的就是这些人都各自与中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据抗日军退伍同志会（MPAJA Ex-Comrades Association），在抗日战争中战死的 1225 人中，有 661 人的家在中国或者家的所在地不明，<sup>⑫</sup>居住在马来亚的人只有 564 人。

另外，8 个抗日军独立队历代最高干部（党代表、正副队长）总计 49 人之中，战死和在监狱中死亡者 10 人，叛离者 2 人。生存者 37 人中，至少 9 人战后去了中国（大部分是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的），<sup>⑬</sup>这已有资料证实。

---

⑩ 《战友报》，1947 年 10 月 17 日。

⑪ 《民声》，1946 年 5 月 23，24，25 日；《选辑》，页 40，359。

⑫ 《南侨日报》，1947 年 9 月 8 日。

⑬ 笔者，〈日本占领马来亚与华人社会〉，见仓泽爱子编，《东南亚史中的日本占领》，（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7），页 339-40。

笔者以前就提出过，马来亚共产党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sup>⑩</sup> 笔者的这一判断，从上记情况中，再一次得到了证明。

但是同战前的几乎所有的马共最高干部都是成年后来自中国大陆，而且是中共党员的客观事实相比较，战时的马共干部呈：（1）中共党员少；（2）多是些幼少年时渡洋来马来亚者；（3）马来亚出生者正在增加，并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这一倾向。这种情况标志着马共要摆脱中共的羁绊，具有向独立的党组织转化的过渡时期性格。但是历史最终并没能向这一方向发展，包括陈平总书记等最高干部事实上都亡命中国。1948年武装斗争以后，马共不得不依靠中国等缘故，马共自己就把独立路线在萌芽时期给铲除掉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马来亚解放斗争带来胜利。

另一个重要点就是与抗战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但陈平、小张（章传庆）、陈田等抗战时期的有势力的一些干部，到1989年和平协议缔结时为止都是停留在党最高干部。这种情况与其说意味着党的安定，莫如说意味着党内不容许批评，欠缺民主主义，党的发展停滞不前，这也许就是失掉了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原因之一。

---

<sup>⑩</sup> 笔者，〈马来亚共产党与抗日战争——“拯救祖国”、“解放马来亚民族”的交错〉，见《亚洲经济》第19卷8号，1978年8月。

（补注1）Yong Ching Fat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eadership,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Movement, 1936-1941” in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1 (1997), pp. 132, 135.

（补注2）同上，页135。

（补注3）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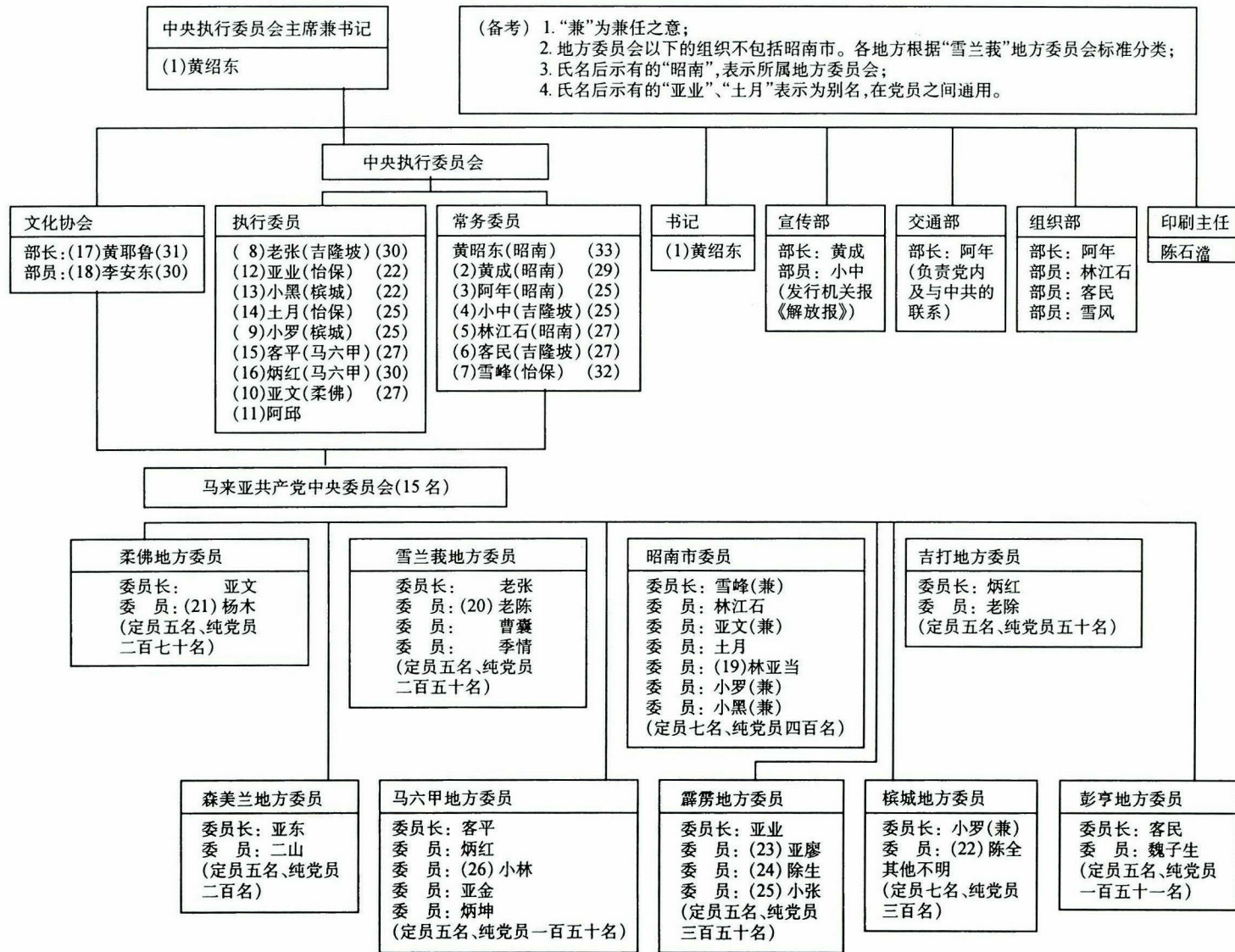
（补注4）同上。

（补注5）同上。

（补注6）至今为止大家一直都认为他出生于1922年。但是最近陈平本人在采访中，说他实际出生于1924年（根据1998年6月20日《星洲日报》）。



# 马来亚共产党组织概要



**图表注：**

1. 此表是从略自筒井千寻，《南方军政论》（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44），页 154、155 的图表修正图。
2. 图表中姓名前的（1）至（26）番号，是笔者为方便本文叙述和进行对照附加的。
3. 姓名后括号中的数字引自原著，表示其年龄。